

# 虎：上海市市立動物園 一隻明星動物的生命史

陳宇晗

---

[提 要] 1932 年，為籌建市立動物園，上海市政府斥資近千元購入一隻老虎。這是上海的動物園中首次展出老虎，吸引大量市民前來參觀，成為市立動物園當之無愧的明星動物。動物園方面為牠精心設計了安全牢固的籠舍，遊客關注牠的飲食與生活狀況。三年後，牠不幸因病離世，一度成為輿論熱議的焦點，甚至被藥商挖掘出商業價值。直至動物園再次購得新虎，才彌補牠離去所產生的負面影響。以生命史的視角考察虎在上海市市立動物園的境遇，並以此為切入點關注動物園的籠舍設計、動物飼養、醫療衛生、社會輿論及動物採購等問題，或有助於進一步審視“動物轉向”對中國近現代史研究的意義。

[關鍵詞] 明星動物 生命史 動物園 動物轉向

[中圖分類號] K26; Q959.9 [文獻標識碼] A [文章編號] 0874 - 1824 (2025) 01 - 0059 - 11

---

1933 年 10 月，德國海京伯馬戲團來到上海演出。團主海京伯 (Lorenz Hagenbeck)<sup>①</sup>造訪了位於文廟對面、開園不久的上海市市立動物園，並即興為在場的數百名遊客表演了一場“虎口脫險”。起初，他只是接近虎舍，設法引起老虎的注意，在虎尚未察覺之際便進入籠中，圍觀者“莫不駭然”。海京伯淡定地向虎展示自己既無武器、也無惡意，虎“且驚且怒”，“繼則凝眸，若有所思”，“毫未張牙舞爪”，於是海京伯得以安然脫身。<sup>②</sup>

海京伯馬戲團的演出在上海灘掀起了一陣熱潮，然而，本文的重點並非海京伯及其馬戲團，而是上海市市立動物園中“配合”海京伯演出的一隻老虎。

受到新文化史的影響，部分學者提出，史學研究已出現“不可否認”的“動物轉向”(animal turn)。<sup>③</sup>這種“動物轉向”意味著研究視角的進一步轉變。長期以來，動物在人類社會的歷史中以“他者”角色出現，往往被忽視。但隨著動物保護主義的盛行，如何在歷史研究中賦予動物平等地位，成為史學研究者面臨的全新挑戰。<sup>④</sup>在中國近現代史的研究領域，對動物個體生命史的書寫無疑是一種嶄新的形式，且聚焦於一隻未被官方命名的動物，更是一種大膽的嘗試。<sup>⑤</sup>

海京伯在接受記者訪問時表示，依其觀察，“中華人士”愛看虎和象，日本人愛看熊、虎和馬，“他國之人”則愛看獅子與象。<sup>⑥</sup>各國民眾在觀賞動物上有各自的偏好，而中國人對虎的偏愛顯然受

傳統文化的影響。早在原始社會，虎便具有神秘而高貴的色彩，被尊為部族圖騰，並用作卜筮活動的工具。到帝制時代，一方面，虎被賦予政治上的象徵意義，另一方面，虎在民眾日常生活中可以入藥、驅邪，是正義與力量的象徵。<sup>⑦</sup>然而，隨著經濟重心南移，人虎關係的緊張愈演愈烈，甚至出現所謂的“虎患”。<sup>⑧</sup>近代以來，城市化進程迫使虎逐漸遠離人類社會，動物園的出現則為市民提供了安全且可近距離接觸虎的機會。<sup>⑨</sup>

上海市市立動物園是 1930 年代上海市政府重點建設項目之一，在 1937 年 8 月閉園前，園中共有動物 5 大類 109 種，年遊客量約百萬人次。<sup>⑩</sup>在眾多動物中，虎無疑是該園的明星動物。具體而言，對虎的考察涉及動物園建設、飼養管理、動物醫療、動物貿易、公眾媒體等多個層面。本文嘗試以傳記形式呈現近代中國動物園中動物的生活狀態，並進一步審視“動物史學”及“後人類史學”對中國近現代史研究的意義。

## 一、初入上海灘

“大虎”是上海市市立動物園的“元老”，其故事至少可追溯至 1931 年。是年，上海市教育局計劃在文廟附近設立一座公辦動物園。而在當年 8 月擬定的計劃草案中，虎被列入“擬選購陳列各種動物表”。<sup>⑪</sup>儘管在此後，購虎的經費預算由 1,300 元減至 1,000 元，但牠依然是動物園計劃中價格不菲的動物之一，僅次於獅和象。不僅如此，動物園還需為虎建造堅固可靠的動物籠舍，這項設施又需近千元的支出。<sup>⑫</sup>二者相加，意味著將大虎帶到上海灘民眾面前的成本，已佔市立動物園總開辦費預算數的近一成。

1932 年 5 月 18 日，大虎運抵上海。因市立動物園建設工程尚未完竣，牠被臨時安置於南市蓬萊市場附近公共學校園內東部的鐵籠中。據媒體報道，大虎由廣西運來，耗資 950 元，身長超過五尺，重達百餘斤。<sup>⑬</sup>這是上海第一隻在動物園中展出的老虎。此前，公共租界工部局設立的極司非而公園（Jessfield Park，又名兆豐公園）動物園因園地狹小，並未飼養老虎。<sup>⑭</sup>因此，大虎對上海市民具有強烈的吸引力。原本的公共學校園，動物區域所佔比重有限，只飼養有少量常見的小型動物，日常參觀的市民“寥如晨星”。而當大虎到來後，整個公共學校園“才熱鬧了起來”。<sup>⑮</sup>從數據上來看，自 1928 年 8 月公共學校園由上海縣教育局移交上海特別市教育局後，三年度的參觀人數分別為 8.78 萬、2.78 萬和 6.25 萬人次。但在 1931 年度（1931 年 7 月至 1932 年 6 月），參觀人數卻高達 18.5 萬人次，超過前三年的總和，<sup>⑯</sup>顯見上海市民對虎的熱情。在大虎之後，豹、袋鼠、鸚鵡、獅子、黑熊等動物陸續引入，亦暫時寄養於公共學校園。<sup>⑰</sup>由於公共學校園承載能力有限，且需負責接待各校師生參觀，市教育局因此制定相應的開放規範，市民可提前索取參觀券或憑證章進入，以維持良好的參觀秩序。<sup>⑱</sup>在某種意義上，公共學校園成為市立動物園的預備機構。

1933 年 1 月 13 日，上海市教育局正式接管市立動物園的第一、二期工程，其中包括兩間大動物舍。<sup>⑲</sup>大虎隨之結束在公共學校園的寄居生活，正式遷居至市立動物園中的“新家”。<sup>⑳</sup>搬遷後，大虎的生活過得頗為安靜，市立動物園的開放日期一再延後，又因上海市中小學校會考委員會借用動物園辦公尚未結束，為保密起見，大虎直至 1933 年 8 月 1 日才正式與市民見面。<sup>㉑</sup>

## 二、大虎的一天——1933 年 8 月 2 日

1933 年 8 月 2 日，星期三，氣溫 24~33℃，微風，有零星小雨。<sup>㉒</sup>這是上海市市立動物園開園的第二天，各項工作仍在逐步磨合。經歷了首日的大客流後，動物園應當已經做好相應的準備，至少

讓工作人員多備了些蓋好印的入園券。<sup>23</sup>

動物園規定的開園時間為早上 8 點,心急的遊客趁天氣尚未炎熱,早早便到門前排隊。園內,工作人員正利用開園前的最後時間清潔動物舍,掃除前夜遺留的污穢,務求以乾淨整潔的狀態迎接遊客的到來。<sup>24</sup>打掃大虎這類猛獸的動物舍並非易事,幸好動物園在設計之初已充分考慮此問題。

為節約成本,大動物舍採取四間合建的模式(如圖 1 所示)。整體坐北朝南,四間呈一字排開,動物與遊客之間隔有運動場的鐵柵、約 1.3 米寬的草地,以及約 1.2 米高的木柵,確保遊客安全和動物安寧。動物舍在設計上充分考慮了安全性,結構分為內外兩部分:外部為一間約 16 平方米的正方形運動場,高約 2.3 米,鋪有水泥或堆小土山,可供大虎日間活動;內部為棲息所及浴池,面積均為 4 平方米,高度僅 1.3 米。浴池內鋪設自來水管與水龍頭,方便清潔動物及動物舍,底部設有出水口與排水陰溝。動物舍之間以水泥磚牆分隔,棚頂為方寸鐵柵,並覆蓋粗鐵絲網,避免發生意外。<sup>25</sup>換言之,大動物舍中的獅、虎、豹、熊各有 24 平方米的生存空間。大虎獨居,得享一室;而隔壁的獅子,則需兩獅共用。<sup>26</sup>初期因經費緊張,僅大虎和隔壁的一對獅子入住大動物舍,豹和熊只能暫且將就一下。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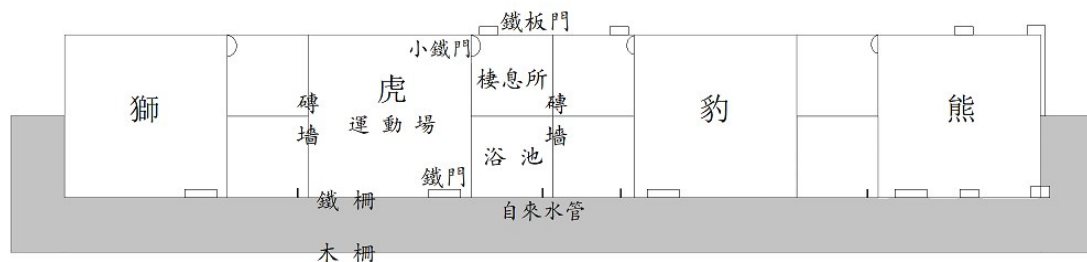


圖 1 市立動物園大動物舍平面圖

資料來源:《市立動物園計劃草案及預算書》(1931 年 11 月 14 日),上海市檔案館藏;上海市教育局檔案,檔案號:Q235/1/2311。

工作人員進入大虎舍內進行打掃、飼餵或消毒等工作時,須根據大虎所在位置操作。若大虎在棲息所內,便可於鐵柵外關閉棲息所的小鐵門,而後開啟正面鐵門進入作業;若大虎在運動場,則可以利用鐵板門將棲息所的小鐵門關上,進入棲息所作業。<sup>27</sup>

上午 8 時整,動物園大門開啟,遊客們熙熙攘攘地購券、入園。對大虎而言,此時仍能享有片刻的清靜,畢竟從入口到大動物舍尚有一段距離。在市立動物園的整體佈局(如圖 2 所示)中,大虎所在的大動物舍位於園區西北部。若將魚池視為動物園的中心,則魚池以西區域無論在佔地面積還是展示動物的數量上都遠超東半部地區。後續動物園的擴建工程亦多集中於西半部,例如修建象場、駱駝舍等。<sup>28</sup>從遊客的動線來看,市立動物園設計的是順時針行進的參觀路線:遊客購券入園後,首先經過東半部的孔雀棚、雜禽舍、鳥亭、水汀動物舍等建築,而後繞過魚池南側的假山進入西半部,依次參觀幾間小動物舍,以及鹿、麂、鸚鵡等動物後,轉過彎便可欣賞到大虎等猛獸,最後經由魚池西側的園路至側門出口便結束整個參觀旅程,離開動物園。

根據現代展覽學觀點,參觀路線的設計直接決定遊客的參觀體驗,不僅適用於博物館、美術館等空間,動物園亦然。<sup>29</sup>在參觀方向上,市立動物園的設計或許與所處的地理位置直接相關。考慮到其主要客流來自老城廂及周邊南市地區,入口正是朝著這個方向,無論是由南側蓬萊市場方向、

經學前街而來的遊客，還是沿文廟路由東側老城廂中心區域前來的遊客，入口所處的位置對他們都很方便。出口的馬路對面是文廟，其中有民眾教育館、圖書館等公共文化設施，可供遊客延伸參觀，也方便經中華路等主幹道疏散人流。在參觀路線上，市立動物園整體遵循“單一參觀路線”的原則，但在細節上為避免人流擁堵，設計有多種路線。例如雜禽舍、孔雀棚與鳥亭三者即可自行安排先後順序，到了假山附近，同樣有兩條道路可供選擇，“一條路是沿著小池子的邊兒走，一條路是在小土堆兒後面走”。<sup>③</sup>無論走哪條路，都不影響接下來的參觀。而在這附近建造的茅亭、假山，可供遊客自東區向西區過渡中休憩娛樂。總體而言，整個參觀行程由相對常見的小型動物逐漸至珍奇的大型動物。大虎所在位置是參觀路線上的最後一站，獅、虎、豹、熊的風采將整個遊覽活動推向高潮。大動物舍旁的草地上還設置有假老虎、假獅子的塑像，可供遊客合影留念。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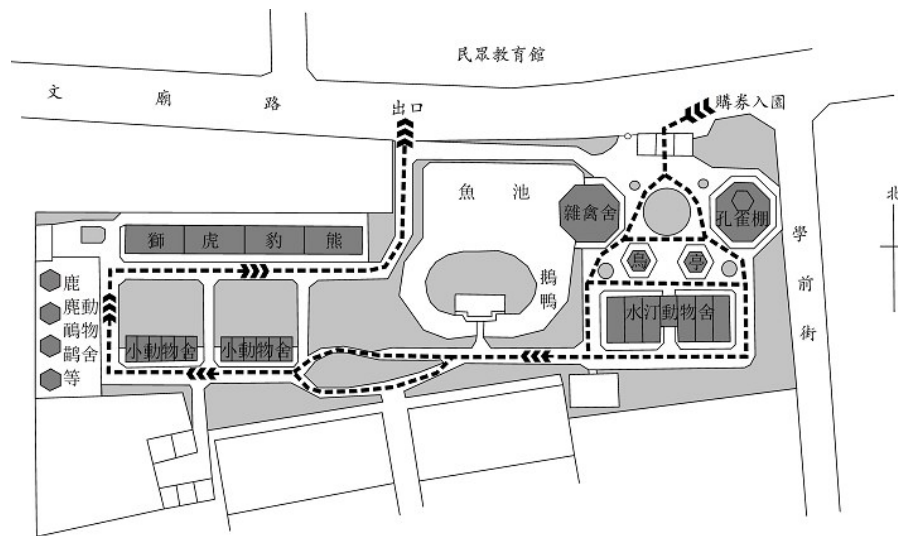


圖2 上海市市立動物園遊客動線圖(1933年)

資料來源：上海市市立動物園：《上海市市立動物園概況(二十二年八月至十二月)》，上海：上海市市立動物園，1934年，不具頁碼。

說明：圖中深灰色區域為動物舍，淺灰色為草地、花木、假山等綠化。

上午9時許，大虎舍前的遊客已陸續增多。動物園工作人員為大虎帶來今日的第一餐。牠日常的食物是牛肉，每天要吃十三四斤之多，<sup>④</sup>每逢星期三按照慣例要“改善伙食”，改吃雞肉來調劑營養。今天卻是例外，送到大虎面前的並不是雞，而是還掙扎著、鮮血淋漓的鴿子。這反倒激起牠的興致，三下五除二便將其撕扯、吞下，引得木柵外的遊客們拍手稱快。<sup>⑤</sup>不料，這一餐給動物園帶來了意想不到的麻煩。

四天後，即8月6日，上海最知名的兩家報紙《申報》和《新聞報》均刊載一封致市立動物園的公開信，撰寫者是尚處於發起階段的中國保護動物會，該會對飼養大虎的方式提出質疑：

據報貴園飼餵虎食，常用鴿類，將其毛皮活活剝去，血肉之軀，尚在盤中，掙扎之時，置入虎檻，虎見攫而食之，觀眾引以為快。竊以為肉食類之動物，以鮮肉飼之可也，以殺死之禽類飼之亦可也。今乃以活活剝皮尚未死絕之禽類飼之，不僅引起觀眾殘忍之觀念，而於兒童見之，尤非所宜。尚望貴園本好生之德，對於肉食類動物之食品，勿再任工人隨意以活剝禽類飼之。<sup>⑥</sup>

市立動物園主任沈祥瑞及時做出回應稱，8月2日原本為大虎等動物備好的雞發現有瘟病，不得已

以鴿子代替。在處理鴿子時，“先將鴿用小線套在嘴上悶死”，後“去毛供食”。但不巧有一隻鴿子並未悶透，導致這一事件的發生。沈祥瑞還表示，對此問題“以後自可留意”，針對中國保護動物會提出的意見，“頗喜外界時賜建議，俾得加以改進”。<sup>⑭</sup>

此外，日常投餵給大虎的牛肉也會有麻煩。大虎的習性決定了牠喜食生肉，但生肉中難免帶有條蟲、鈎蟲、蛔蟲等，不利健康。園方為預防起見，將牛肉煮熟後投餵，大虎卻“不識好歹”。<sup>⑮</sup>為此，工作人員利用電冰箱，將寄生蟲凍死後，再解凍飼餵動物，在一定程度上減少寄生蟲隱患。<sup>⑯</sup>

由於大虎的生活習性屬晝伏夜出，白天動物園開放時經常顯得沒什麼精神，甚至“不大行動”。每日兩次的進食是牠少有的較為活躍的時候，因而動物園方面推薦遊客在上午 9 點和下午 3 點半左右前來參觀。<sup>⑰</sup>如此的安排也展現出市立動物園在滿足動物需求與遊客參觀興趣之間的平衡嘗試。

在許多遊客看來，大虎每日都在睡覺，“腹部向著天，頭足舒伸著”。儘管籠外吵吵嚷嚷，牠絲毫不為所動，“睬都不來睬你”。然而遊客們卻熱情不減，擁擠在大虎面前，駐足觀看，以至於牠的動物舍前“觀客最多”，“恨不探身入柵，一瞧究竟”。<sup>⑱</sup>

隨著夜幕將近，動物園又恢復寧靜。工作人員統計出當日的遊客數量，成人和兒童共計 10,432 人，比開園首日還多出一百餘人。<sup>⑲</sup>大虎順利完成一日的“工作”，夜晚的牠比白天顯得更加精神抖擻，環繞著運動場踱步，等待著新一天的到來。

### 三、“肺癆猛於虎”

好景不長，上海市市立動物園開園還未滿兩年，大虎便是一個冬日溘然而去。

為保障動物的健康與衛生，市立動物園採取了一系列措施。按照動物園章程的規定，1933 年 9 月，留美博士王兆麒被正式聘為市立動物園的獸醫顧問。<sup>⑳</sup>此外，園方工作人員會定期對動物進行健康檢查，並將糞便送至上海市衛生試驗所檢驗。在動物園主任沈祥瑞看來，動物疾病的防治是動物園工作中“最感困難者”，而市立動物園的做法在一定程度上實現對動物健康狀況的動態監測。<sup>㉑</sup>

不僅如此，市立動物園還對動物棚舍進行日常清潔與消毒。每天上午和下午開園前，園役均對動物棚舍沖洗打掃。如遇動物排洩糞便，園役也須隨時掃除。不過，由於園內面積狹小，空氣流通不暢，“雖竭力清除”動物糞便，但仍難免有臭味。消毒工作則使用消毒藥水和噴火機噴火消毒兩種方式進行。夏季每隔三日噴灑消毒藥水，每兩星期噴火消毒；冬季每十天左右消毒一次。<sup>㉒</sup>

儘管有種種預防性的措施，但對大虎而言，工作人員並未及時發現牠身體的異樣。1935 年 2 月 17 日上午，大虎突然出現嘔吐症狀，下午的食量減半。而在此之前，1 月 11 日和 2 月 15 日的例行健康檢查中僅發現牠有蛔蟲、十二指腸蟲等小問題。經王兆麒醫治後，次日大虎食量驟減，僅食用半斤牛肉，且對藥劑“嗅而不食”，與涼開水混合後，“亦不飲服”。19 日，大虎停止進食，“呼吸較急，精神疲乏，惟行動如常”，王醫生三診後“換方給藥”。2 月 23 日，大虎“呼吸益急，精神更疲”，王醫生和另一位程姓獸醫博士<sup>㉓</sup>聯合會診給藥後，仍不見效，隨即於下午 5 時 20 分病斃。<sup>㉔</sup>

生老病死本就是自然規律，動物的離世在動物園中並不罕見。僅就市立動物園而言，1934 年死亡的獅、斑豹、袋鼠，1935 年的虎、熊，1936 年的灰象均屬價值不菲的大型動物。<sup>㉕</sup>然而，由於大虎明星動物的特殊身份，以及奇特的死因，此事後續的輿論發展恐怕遠超出動物園方面的預期。

實業部上海獸疫防治所解剖了大虎的屍體，檢查內臟後，發現肺部的腐爛部分“多而且大”，斷定為經空氣傳播的“出血性敗血症式之肺炎”。該病死亡率極高，難以醫治。<sup>㉖</sup>不過，市立動物園並



未及時向大眾公佈相關情況。在大虎曾居住過的動物舍前，高懸著“猛虎現正患病”字樣的通告牌。直到10月初，各種消息逐漸流出。10月下旬，大通社記者“向該園探悉”，才得知大虎“業於日前病斃”，隨後各報紛紛刊載大虎的死訊，此時已逾半年有餘。<sup>④</sup>類似的情況並非個例。就在大虎死訊公佈後，有遊客慕名前去參觀“大如圓桌面”的巨鱉，卻怎麼也找不到。直至詢問動物園工作人員，才得知巨鱉也已死去，且死因不明。<sup>⑤</sup>

如何處理明星動物的死亡，是困擾動物園的棘手難題。因為，牠們的死亡同時意味著動物園資產和遊客數量的減少。在動物園經營者看來，動物死亡對動物園帶來的打擊更多是經濟層面的，而非情緒上的。<sup>⑥</sup>也有市民認為，動物園方面是怕消息外洩後“有減參觀者之興致”，因而決定“閉而不宣”。<sup>⑦</sup>此外，在大虎死亡一事的處理上還反映出另一個問題——市民關心動物園的具體情況，但市立動物園並無官方對外宣傳的渠道，缺乏同社會公眾的有效溝通。其後果便是，報刊所登載有關動物園的消息，一部分是記者主動探尋而來，另一部分則純屬道聽途說，既誤導了民眾，也對動物園的形象造成負面影響。<sup>⑧</sup>

回到大虎身上，民眾對大虎死訊的討論逐漸延伸至關注自身的生活環境，其中既包括環境污染，也有對社會環境的抱怨。《從虎死肺病說到都市的防癆運動》一文顯然將重點放在前者，作者“悟玄子”自稱雖非獸醫，但認為大虎的死因“都〔多〕半是空氣惡劣的緣故”。上海“人煙稠密”，“工廠林立、樹木稀少、灰沙濃厚”，對動物而言並非適宜的環境。<sup>⑨</sup>著名報人嚴獨鶴則在其主編的《新聞報》副刊“新園林”中，對該事件有一些頗為獨到的評論：“足見上海的空氣，連老虎都有些吃不住。而上海人卻終日生活於這種空氣中，倒著實可怕了。”看似指實實在在的空氣，背後也暗含著對上海、乃至整個國家社會風氣的不滿。文中還寫到，大虎或許是因為“以前吸慣了高山上的空氣”，來到上海之後不習慣，又“不能像當代大老官一樣，上山養病”。<sup>⑩</sup>所謂上山養病的“大老官”，或許影射的是蔣中正。1935年，中日之間的戰爭已迫在眉睫，而蔣卻選擇在7~9月間赴四川峨眉山避暑遊玩，期間還不忘回到廬山的寓所休憩。<sup>⑪</sup>這顯然令嚴獨鶴感到不滿。

對輿論熱點頗為敏感的廣告商，也從大虎的死訊覺察出背後的商業價值。相關消息傳出後，“克癆”、“韋廉士吸入式止咳片”、“若素”等多種藥物均在宣傳中以“肺癆猛於虎”為廣告語，並以大虎病斃作為素材，時間跨度從1935年直至1941年。<sup>⑫</sup>例如“韋廉士吸入式止咳片”廣告的開頭便是：“世人殆無不知，虎乃獸中最凶猛、最壯健之一。但不久以前，上海市立動物園一隻老虎，竟死於小不可見的肺病微生蟲。試問，體格能更強於虎者究有幾人乎？”<sup>⑬</sup>與此類似，上海衛生療養院院長米勒耳醫師（Harry Willis Miller）所著的介紹肺癆病的著作中，開篇首頁便引用市立動物園猛虎死於肺癆一事，凸顯肺癆病對人體的嚴重危害。<sup>⑭</sup>

值得一提的是，用“肺癆猛於虎”作為肺病藥品的宣傳並非因大虎病死而產生。早在1926年，上海中西藥房為宣傳藥品“痰敵”便有類似的說法——“猛於虎！毒於蛇之肺癆”。“痰敵”廣告之所以稱肺癆“猛於虎”是因其傳染性強，“禍害之烈，勝於猛虎毒蛇”。<sup>⑮</sup>大虎病死後，這句廣告語便具有雙關的含義：不僅是象徵意義的虎，更是指實際意義的虎。<sup>⑯</sup>

由此觀之，大虎的死亡在當時已傳播為影響面遠超上海的社會性事件。而這些真假難辨的醫藥廣告借助新聞事件進行自我宣傳的同時，也對新聞事件本身進行二次傳播，進一步擴大了新聞的影響和受眾面。從接受史的角度來看，這些建立在消費大虎死亡一事的廣告宣傳，<sup>⑰</sup>其目的無非是加劇民眾的恐慌，進而製造“盲信的消費者”。<sup>⑱</sup>

在大虎不幸離世後，尋覓一隻新虎來接替成為市立動物園必須面對的問題，但這絕非易事。

#### 四、“接班虎”難覓

無論是對於市立動物園還是上海市民而言，虎都是不可或缺的動物。大虎離去後，灰象也在次年春天不慎觸電身亡。<sup>②</sup>兩種明星動物相繼離世，導致“從前車水馬龍的市立動物園頓時變成門可羅雀”。<sup>③</sup>因此，尋覓“接班虎”一事迫在眉睫。

此次覓虎，動物園著實費了些周折。1936年1月，有消息稱市立動物園在山東購得猛虎和雄狼各一隻，後者確有其事，前者則為謠傳。<sup>④</sup>同年4月又有消息稱杭州西湖畔有老虎出沒，市立動物園將派人前去捕捉。<sup>⑤</sup>沈祥瑞為此親自向記者澄清。<sup>⑥</sup>同一時期還有傳言稱，市立動物園看上了蘇州張善孖、張大千兄弟所養的乳虎，此事並非空穴來風。

1936年4月，市立動物園忽然收到蘇州來函，稱該地張善孖養有一頭八個月大的幼虎，鄰居認為有風險，想讓上海的動物園將其“收入麾下”。市立動物園第一時間致函商購，未獲回覆，又派遣職員包纏虹赴蘇州當面商洽。<sup>⑦</sup>綜合多家媒體的報道，張善孖稱虎是其弟張大千所有，為郝夢齡軍長在貴陽山中“圍剿”紅軍時偶得。軍長將其中一隻贈予張氏昆仲，用於教授弟子臨摹寫生。<sup>⑧</sup>針對市立動物園的請求，張善孖一口答應將虎轉贈，“絕無作價之理”，但要等張大千返家後安排相關事宜。<sup>⑨</sup>然而不久後沈祥瑞在接受媒體詢問時解釋，“物主鑒於虎尚幼小”，打算再等稍長大後贈給動物園，大概一年之內都不可能送來。<sup>⑩</sup>此事最終不了了之。

因而，採辦老虎的重任最終還是落在了與市立動物園長期合作的上海豫園鼎興泰鳥獸行。1936年4月，鼎興泰老闆顧志軒自香港動物商處購得一頭印度虎，價格為1,250元，不料因“裝運不慎”，尚未抵達上海便不幸“斃亡在途”。<sup>⑪</sup>由於合同中有相關約定，市立動物園並未受任何損失，這正是經由動物商訂購動物的優勢之一。沈祥瑞在其所著《動物園》一書中曾提到，動物園同動物商人預訂時僅需支付50%的訂金，剩餘費用一般在動物到貨後三個月，且動物無疾病發生時付清。如果動物在運輸過程中，乃至到貨一個月內發生疾病或不幸死亡，都將由動物商人完全負責。到貨一個月之外、三個月之內發生上述情況，二者可以酌定賠償數目。<sup>⑫</sup>“動物代理訂購”作為動物園相關的新興行業，伴隨著近代中國動物園的發展進程而逐漸興起。

1936年7月，鼎興泰又從新加坡購得一頭印度虎，價格更為低廉，僅需1,100元。<sup>⑬</sup>8月6日下午，動物園工作人員利用起重機，將老虎和一同運抵的大象裝入事先租定的巨大駁船，由浦東藍煙囪碼頭拖至浦西，換裝卡車後拉入園中，安頓於動物舍內。<sup>⑭</sup>至此，上海市市立動物園結束長達近18個月的“虎荒”，小虎成功“繼任”。

小虎的年齡在3歲半左右，體重約150磅，身長六七尺，“全身深黃色，而間以黑紋”。<sup>⑮</sup>從數據上看，牠的體型與大虎相差並不大。在牠到來後，市立動物園的遊客數量大增。由於市立動物園擁有超過百種動物，很難精確量化某種動物的增加或減少對遊客數量所產生的具體影響。但如果跨年度分析便會發現，往年七八月份上海氣溫炎熱且多雨，遊客數量位於低谷期，但1936年8月份卻一反常態，遊客數量甚至高於同年6月份。<sup>⑯</sup>這其中自然有小虎的“功勞”，也反映出“一般市民對於老虎感著特殊的興趣”。<sup>⑰</sup>

小虎在市立動物園的生活條件，甚至讓前來參觀的遊客們羨慕不已。據動物園主任沈祥瑞介紹，小虎每日要吃掉八斤牛肉和三隻鮮雞，甚至還有雞蛋等食物。有遊客感慨道，“其營養之豐富，遠勝過都市生活中大多數的人”。<sup>⑱</sup>但這樣安穩的日子僅僅一年，1937年夏，戰爭摧毀了一切。在戰火紛飛、人心惶惶的危急關頭，沈祥瑞不忘安頓好小虎，為牠尋覓一個安全的新去處。<sup>⑲</sup>

## 結語

大虎作為市立動物園的明星動物，自引入以來不僅成為市民關注的焦點，也以自身的經歷展現了現代都市對動物的消費與再詮釋。本文通過書寫牠的生命史，從牠來到上海，到動物園中的公開展示、生活條件，直至最終死亡，試圖還原一個明星動物在動物園中實際的生活狀態。同時，本文也探討了人類如何賦予動物象徵意義，並通過動物園這一公共空間進行再生產。哲學家路德維希·維特根斯坦(Ludwig Wittgenstein)有言，“如果獅子會說話，我們也無法理解牠”。<sup>①</sup>大虎陪伴上海市民數載，但我們永遠也不可能知道牠的所思所想。這當然是動物史研究所面臨的重要課題，反之，這也是動物史研究的魅力所在。

將動物，以及過往研究者忽視的諸如女性、底層民眾，帶回歷史研究的中心舞台，是近半個多世紀來社會發展的直接影響，有學者稱其為“歷史研究的民主化趨勢”。<sup>②</sup>在“動物轉向”和“後人類史學”的影響下，史學研究者逐漸意識到，動物並非只是人類社會的點綴，牠們值得深入探討。不過，為特定動物個體撰寫傳記的寫作方式在中國近現代史，乃至中國史的研究領域都是一種嘗試，難免存在諸多不成熟之處。由於相關研究不足和材料的缺失，目前甚至連大虎的性別、年齡、品種等基本信息都難以確定，這顯然為傳記寫作造成了一定的困難。

此外，以傳記作為切入動物史研究的途徑有其獨特的價值。一方面，傳記作為一種重要且直接的研究方法，為我們提供重構個體歷史的可能性，而將其運用於動物史書寫，則毫無疑問保證了動物在歷史寫作中的主體地位。<sup>③</sup>另一方面，動物的生命史展現出動物個體的獨特經驗，一定程度上規避了“碎片化”的風險，也避免使動物淪為串場的工具，從而被質疑“新瓶裝舊酒”。<sup>④</sup>不過，歐美學者採用擬人化、甚至虛構的方式所進行的動物傳記寫作，是否已超出歷史研究的範疇，恐怕還有進一步討論的空間。<sup>⑤</sup>

總而言之，本文透過大虎的生命史試圖打開一扇窗，展現動物在近現代中國城市生活中所佔據的一席之地。“後人類史學”與“動物轉向”本質上為中國近現代史的研究帶來一種新的思考方式。這有待學者們的共同努力，在書寫出更多非“人類中心主義”作品的基礎上，“後人類史學”的前景或許會更加清晰與明瞭。

---

① “海京伯”即 Hagenbeck 的音譯，今多譯為哈根貝克。本文的“海京伯”指德國著名動物商人卡爾·哈根貝克(Carl Hagenbeck)的次子洛倫茲·哈根貝克。

②⑥《海京伯游上海市立動物園》，上海：《時事新報·本埠附刊》，1933年10月24日。

③ Dan Vandersommers, “The Animal Turn in History,” *Perspective on History*, November issue, 2016; 陳懷宇：《歷史學的“動物轉向”與“後人類史學”》，長春：《史學集刊》，2019年第1期；陳懷宇：《動物史的起源與目標》，河南開封：《史學月刊》，2019年第3期；沈宇斌：《全球史研究的動物轉向》，河南開封：《史學月刊》，2019年第3期。

④ 動物在史學研究中是“失語”群體，考察牠的歷史需要借助人類的記載。不過目前在歐美學界的研究中，已出現一些盡可能避免使用人類立場史料進行動物史研究的成果。例如在 Susan Nance 主編的 *The Historical Animal* 一書中有兩章分別考察名為 Michael 的大猩猩和名為 Tony 的馬，對於二者的研究主要通過影像資料和聲音入手。“後人類史學”(posthuman 或 posthumanist history)思路下的動物史研究，的確具有一定的開拓性，但對本文所研究的對象並不可行。由於市立動物園檔案全宗現已不存，甚至連記載動物購買和死亡的材料都難以查考。見 Concepción Cortés Zulueta, “Nonhuman Animal Testimonies: A Natural His-



tory in the First Person?” in Susan Nance, ed., *The Historical Animal*, Syracuse: Syracuse University Press, 2015, pp.118-132; Courtney E. White, “Tony the Wonder Horse: A Star Study,” in Susan Nance, ed., *The Historical Animal*, Syracuse: Syracuse University Press, 2015, pp. 289-308; 王晴佳:《人寫的歷史必須是人的歷史嗎?“後人類史學”的挑戰》, 長春:《史學集刊》, 2019 年第 1 期。

⑤一些撰寫動物傳記的嘗試可參看 André Krebber and Mieke Roscher, eds., *Animal Biography: Re-framing Animal Lives*, Cham: Palgrave Macmillan, 2018; Eric Baratay, *Animal Biographies: Toward a History of Individuals*, trans. by Lindsay Turner, Athens: The University of Georgia Press, 2022。涉及的動物包括查理十世的長頸鹿、英國動物園的黑猩猩、日本的忠犬八公等。由於上海市市立動物園先後有兩只虎展出, 且並未命名, 為論述方便, 本文用“大虎”和“小虎”加以區分, 重點考察前者。

⑦屈育德:《論中國傳統文化中虎的觀念》, 瀋陽:《社會科學輯刊》, 1986 年第 4 期。由於虎是亞洲特有的動物, 因而對中國、韓國等國家的文化產生了深遠影響。見張幸、陳懷宇:《歐美學界的亞洲動物史研究新趨勢》, 長春:《社會科學戰線》, 2023 年第 5 期, 第 157 頁。

⑧曹志紅:《福建地區人虎關係演變及社會應對》, 天津:《南開學報》, 2013 年第 4 期, 第 98 頁。

⑨清光緒年間, 盛宣懷的留園中曾展出一隻老虎, 不料遊客們“爭做武松第二”, 雖專門派人照看, 但老虎仍不幸斃命。國人對老虎的態度由此一例可見一斑。見高洪興:《盛宣懷檔案中的清末民初中國社會生活》, 收入上海圖書館歷史文獻研究所編《歷史文獻》第 13 輯, 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 2009 年, 第 488 頁。此則史料承張仲民教授指點, 謹此致謝!

⑩上海園林志編纂委員會編:《上海園林志》, 上海:上海社會科學院出版社, 2000 年, 第 373 頁。

⑪《市立動物園計劃草案》(1931 年 8 月 26 日), 上海市檔案館藏:上海市教育局檔案, 檔案號: Q235/1/2311。

⑫《市立動物園計劃草案及預算書》(1931 年 11 月 14 日), 上海市檔案館藏:上海市教育局檔案, 檔案號:

Q235/1/2311。為節約經費, 獅、虎、豹、熊四間大動物舍連造, 總計預算 3,690 元, 平均每間 922.5 元。

⑬王乃吉:《學校園新到猛虎》, 上海:《新聞報·本埠附刊》, 1932 年 5 月 22 日; 上海市市立動物園:《上海市市立動物園概況(二十二年八月至十二月)》, 上海:上海市市立動物園, 1934 年, 第 10 頁。此處與朱英在《上海動物園:近代中國休閒娛樂與社會教育的新設施》(河南開封:《史學月刊》, 2022 年第 1 期, 第 36 頁)一文中引用的《申報》報道略有出入, 暫以動物園方面的出版物為準。

⑭井蛙:《兆豐花園及動物園之一瞥》, 上海:《時事新報》, 1928 年 6 月 17 日。

⑮王乃吉:《學校園的動物》, 上海:《新聞報·本埠附刊》, 1932 年 10 月 5 日。

⑯《第一公共學校園參觀人數統計表》, 收入上海市教育局《公共學校園》, 上海:上海市教育局, 約 1932 年, 第 101~103 頁;《市立第一公共學校園概況統計表》, 收入上海市教育局《上海市教育統計》(中華民國二十年度), 上海:上海市教育局, 1933 年, 第 81 頁。

⑰《市立動物園近訊》, 上海:《申報》, 1932 年 12 月 19 日。

⑱張仁聲:《到一二八戰跡展覽會去!》, 上海:《新聞報·本埠附刊》, 1932 年 8 月 21 日。

⑲《二十二年一月十三日接管市立動物園工程清單》(1933 年 1 月 21 日), 上海市檔案館藏:上海市工務局檔案, 檔案號: Q215/1/8254。

⑳《動物園工程大部落成》, 上海:《時事新報》, 1933 年 2 月 4 日。

㉑㉒沈祥瑞:《市立動物園概況報告》, 上海:《上海市教育局無線電播音演講集》, 1933 年第 6 期, 第 7 頁; 第 9 頁。

㉓《八月份上海市天氣觀測概況》, 上海:《上海市水產經濟月刊》, 1933 年第 2 卷第 8 期, 第 18 頁。

㉔㉕㉖㉗㉘㉙上海市市立動物園:《上海市市立動物園概況(二十二年八月至二十五年六月)》, 上海:上海市市立動物園, 約 1936 年, 第 47 頁; 第 40~43 頁; 第 6、48 頁; 第 47 頁; 第 11~12 頁; 第 4~23 頁; 第 12 頁。

㉚㉛《市立動物園計劃草案及預算書》(1931 年 11 月 14 日), 上海市檔案館藏:上海市教育局檔案, 檔案號: Q235/1/2311。單位均已換算。

②⑥《現有動物種類一覽》，收入上海市市立動物園《上海市市立動物園概況(二十二年八月至十二月)》，上海：上海市市立動物園，1934年，第10頁。

②⑨于海勃：《打開敘事空間的大門——西方博物館的展陳設計》，北京：中國戲劇出版社，2021年，第106~110頁。

③⑩逸子：《市立動物園巡禮(下)》，上海：《新人》，1935年第1卷第45期，第903頁。

③⑪沈祥瑞：《民眾教育推行報告及指導——關於市立動物園》，收入蔣建白、聶海帆編《上海市教育局民國廿三年播音演講集》，上海：上海市教育局，1935年，第33頁。

③⑫《動物會保護動物》，上海：《申報》，1933年8月6日；《市立動物園將舉辦動物競賽》，上海：《申報》，1933年8月7日。

③⑬《動物會保護動物》，上海：《申報》，1933年8月6日；亦刊於同日上海《新聞報》。

③⑭《市立動物園將舉辦動物競賽》，上海：《新聞報》，1933年8月7日。

③⑮《上海市市立動物園為衛生局函詢本園獸醫問題呈請核示的呈》(1933年8月25日)，上海市檔案館藏：上海市教育局檔案，檔案號：Q235/1/497；沈祥瑞：《老虎》，上海：《快樂家庭》，1937年第1卷第6期，第31頁。

③⑯⑰沈祥瑞：《早年上海動物園回憶錄》，上海：《中國動物園年刊》，第7期，1984~1985年合刊，第201頁；第202頁。

③⑱沈祥瑞：《民眾教育推行報告及指導——關於市立動物園》，收入蔣建白、聶海帆編《上海市教育局民國廿三年播音演講集》，上海：上海市教育局，1935年，第33頁。不過，在當下的動物保護者看來，這樣的方式強行改變動物自然的飲食習慣，每日兩次的餵食時間“是人的時間，而不是動物的時間”，“是行政的考慮，也是給觀眾看的秀”。見陳燕遐：《猿猴能說話嗎？西式的另類動物書寫》，收入陳燕遐、潘淑華編《“牠”者再定義：人與動物關係的轉變》，香港：三聯書店(香港)有限公司，2018年，第71頁。

③⑲逸梅：《動物院一瞥》，上海：《金剛鑽》，1933年8月24日。

③⑳《上海市市立動物園售票月報表》(二十二年八月

份)，收入上海市市立動物園《上海市市立動物園概況(二十二年八月至十二月)》，上海：上海市市立動物園，1934年，不具頁碼。

④①《上海市教育局函請遴選獸醫人才以便聘為動物園獸醫顧問的公函》(1933年9月16日)，上海市檔案館藏：上海市教育局檔案，檔案號：Q235/1/497；《上海市教育局聘王兆麒為市立動物園獸醫顧問的聘書》(1933年9月29日)，上海市檔案館藏：上海市教育局檔案，檔案號：Q235/1/497。

④②疑為程紹迴。他於清華大學畢業後，先後獲得美國艾奧瓦州立農工大學(今艾奧瓦州立大學前身之一，Iowa State University)獸醫博士學位和約翰·霍普金斯大學(Johns Hopkins University)衛生科學博士學位，時任上海血清製造所(1934年改為獸疫防治所)主任。

④③軼齋：《文廟鯨虎記》，上海：《時代日報》，1935年10月5日；《動物園猛虎病肺斃命》，上海：《申報》，1935年10月24日。

④④夢白：《動物園的小滄桑》，上海：《時事新報·本埠附刊》，1935年11月23日。

④⑤瓊·莫莎德：《如何擁有屬於自己的動物園》，尤丹婷譯，北京：商務印書館，2019年，第183頁。

④⑥軼齋：《文廟鯨虎記》，上海：《時代日報》，1935年10月5日。

④⑦此中人：《跑新聞(六四)·動物園》，上海：《福爾摩斯》，1934年1月20日。

④⑧悟玄子：《從虎死肺病說到都市的防癆運動》(二)，上海：《上海報》，1935年11月10日。根據裴廣強的測算，近代上海的空氣污染程度在1930年代初達至最高峰。參見裴廣強：《近代上海的空氣污染及其原因探析——以煤煙為中心的考察》，台北：《中央研究院近代史研究所集刊》，第97期，2017年9月，第76頁。

④⑨獨鶴：《老虎生肺病》，上海：《新聞報》，1935年10月25日。

④⑩呂芳上主編：《蔣中正先生年譜長編》(第4冊)，台北：國史館、中正紀念堂、中正文教基金會，2014年，第658~689頁。

④⑪編者：《肺癆猛於虎》，上海：《新聞報》，1935年12月18日；《肺病猛於虎》，北平：《華北日報》，1936年1月22日；《肺癆猛於虎》，天津：《東亞晨報》，1941年2月20日；《肺癆猛於虎》，山東青島：《青島新民報》，1941

年3月8日。

⑤⑥《肺癆猛於虎》，北平：《華北日報》，1936年1月22日。

⑤⑦米勒耳：《隱敵——如何防禦》，梅晉良譯，上海：時兆報館，1935年，不具頁碼。

⑤⑧《猛於虎！毒於蛇之肺癆》，上海：《申報》，1926年11月12日。

⑤⑨對此還有一種解讀，《新聞報》有關“克癆”的藥品廣告中提到，“肺癆猛於虎”的“虎”也指“虎列拉”，即霍亂，因其致命性強而將二者相提並論。見編者：《肺癆猛於虎》，上海：《新聞報》，1935年12月18日。

⑥⑩巧合的是，同年上海還發生一起類似事件。1935年3月，著名女演員阮玲玉自殺身亡，此事轟動全國，並被電影界、戲曲界、出版界、商業界等作為炒作和商業利用的素材。因而，當時有論者對輿論和傳媒的狀況提出了批評。見岩間一弘：《上海大眾的誕生與變貌：近代新興中產階級的消費、動員和活動》，葛濤、甘慧傑譯，上海：上海辭書出版社，2016年，第175~178頁。但據筆者所見，針對消費大虎死訊的廣告商，並未見相關批評。

⑥⑪張仲民：《近代中國“東亞病夫”形象的商業建構與再現政治》，上海：《史林》，2015年第4期，第118頁。

⑥⑫王光濟：《市立動物園訪猛虎、巨象、黑熊》，上海：《時事新報》，1936年8月14日。

⑥⑬《市立動物園新添虎狼》，上海：《鐵報》，1936年1月17日；上海市市立動物園：《上海市市立動物園概況（二十二年八月至二十五年六月）》，上海：上海市市立動物園，約1936年，第21頁。

⑥⑭《市立動物園願捉西湖猛虎》，上海：《時事新報》，1936年4月16日。

⑥⑮⑥⑯香草：《參觀動物園 悶人天氣的好去處》，上海：《世界晨報》，1936年5月10日。

⑥⑰《蘇州紳士養有八月稚虎一頭》，上海：《申報》，1936年4月27日。

⑥⑱李伯琦：《網師園訪虎記》，杭州：《東南日報》，1936年5月14日。

⑥⑲《張善孖張大千贈動物園乳虎》，上海：《時事新報》，1936年5月3日。

⑦①⑦③《上海市政府致審計部上海市審計處據呈報動物

園所購灰象猛虎已到園函煩派員參加驗收的公函》（1936年8月14日），上海市檔案館藏：審計部上海市審計處檔案，檔案號：Q123/1/661。

⑦②沈祥瑞：《動物園》，上海：商務印書館，1937年，第8~9頁。

⑦④⑦⑤彤：《市立動物園新到巨象猛虎》，上海：《時事新報》，1936年8月8日。

⑦⑥上海市市立動物園：《上海市市立動物園概況（二十二年八月至二十五年六月）》，上海：上海市市立動物園，約1936年，第29~36頁；《動物園遊客 去年一年間達八十九萬》，上海：《時代報》，1937年1月4日，第3版。

⑦⑦江奇：《在市立動物園看新來的象和虎》，上海：《大公報》，1936年8月10日。

⑦⑧《動物園見聞錄》，上海：《大公報》，1936年9月3日。

⑦⑨有關戰爭爆發後市立動物園對小虎等動物的安置，詳另文專門探討。

⑧⑩ Ludwig Wittgenstein, *Philosophical Investigations*, trans. by G. E. M. Anscombe, Oxford: Basil Blackwell, 1986, p.223.

⑧⑪ Harriet Ritvo, “Animal Planet,” *Environmental History*, Vol. 9, No. 2 (April 2004), p.205.

⑧⑫ André Krebber and Mieke Roscher, eds., *Animal Biography: Re-framing Animal Lives*, 2018, pp.3-6.

⑧⑬ 李鑑慧：《由邊緣邁向中央：淺談動物史學之發展與挑戰》，台南：《成大歷史學報》，2020年第58號，第259~260頁。

⑧⑭ Eric Baratay, *Animal Biographies: Toward a History of Individuals*, trans. by Lindsay Turner, Athens: The University of Georgia Press, 2022, pp.2-5; André Krebber and Mieke Roscher, eds., *Animal Biography: Re-framing Animal Lives*, p.9.

作者簡介：陳宇晗，四川省社會科學院歷史研究所助理研究員，博士。成都 610071

[責任編輯 桑海]